

了社会的分化，最终导致带有族群特征的冲突骚乱不断发生。

而中国之所以识别并确定 56 个民族，又是因为要实践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从政治学理论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很难不被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在一个奉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地方自治本身就包含有民族自治所能提供的诸项内容，如果没有地方自治之实，则民族自治亦成画饼。中国名义上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但迄今为止，仅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了民族自治条例的实施细则，不能不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本身与中国现行体制有难于嫁接的地方。

从历史角度而言，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将本已独立出去的民族地方重新纳入新国家的权宜性制度安排，并非严密推理和论证设计的结果。

从该制度在苏联与俄国实践的结果看，它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俄罗斯，也造成了不同自治实体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矛盾。

中国大陆现今民族政策实施已逾六十年，从历史效果看，它根除了中国旧时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与仇恨，为塑造今日稳固的国家认同居功至伟。

若与西方国家做横向比较，无论是以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援助论，还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看，60 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大陆都远远走在西方国家的前面。但以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稳定角度看，则中国大陆民族政策在物质上投入甚多，而效果上未有同样收获。

今日中国大陆正值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尤其在民族地区，任何社会矛盾都易上升变成民族矛盾。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矛盾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局部地区民族问题较为突出。在中央继续加大帮扶政策和维稳措施时，亦应回过头来，从源头上重新审视检讨大陆民族政策。

## 【论 文】

# 没有身份的民族<sup>1</sup>

作者：赵家鹏

大陆根据苏联学说进行民族身份认定，基于种种考虑，只认定存在 56 个民族，留下了穿青人等一批对民族身份有争议的人群。

李从国相信老辈人的解释：腕上三寸处，那圈浅浅的印痕，是当年穿青人被汉人拐骗捆绑所致。李从国当过官，如今经商下海，事业颇顺却为身份所苦。他的身份证民族一栏标记为苗族，但他总要向人摆手解释：“我不是苗族，我是穿青人，穿青人第一个博士。”

以前，对方追问“穿青人是什么”时，李从国会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展示臂上勒痕，如今身体发福，“勒痕”不再明显。

在大陆官方民族统计中，穿青人被认作汉族，不在 56 个民族之列。多数穿青人对此并不认同。在民族学界，穿青人这个族群被称为“已识别待定民族”。

据大陆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安顺及六盘水市等地；贵州省内穿青人口约 67 万，占全省人口 1.7%，以织金和纳雍两县最多，分别为 23 万和 22.5 万，与其他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

### 被识别成汉人

出生在黔西小县织金的张成坤，虽年逾古稀，仍记得幼年时，堂屋中的五显神坛总是格外庄重，梳三把头的祖母告诉他，这是穿青人的神。稍大一点，他目睹镇上族人常与汉人打架，大家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0-33 页。



管汉人叫“穿蓝的”。在穿青与穿蓝的恩仇往复中，幼年的张成坤对身份有了最初概念。

在穿青人看来，自己族群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宋元，那时贵州已有了“土人”记载，而“土人”便是“穿青人”前身，其渊源可追自古代“五溪蛮”。

明清时期，大批汉族移民群体到来，“土人”，有了被了解机会。当时，人们称穿青人为“里民子”、“仲家”等。“穿青”名号也见于明初，本是他称，有别于“穿蓝的”汉人，随着青蓝矛盾，逐渐成为本族自称。

在张成坤记忆中，青蓝矛盾直到中共政权成立后才逐渐终结。1950年元月8日，织金和平解放，两年后土改，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始让位于阶级斗争。

中共当时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故在土改户籍登记中，设立民族统计一栏。穿青人名号由是才被国家中枢知晓。

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识别工作也随即展开。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工作始于1955年，由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社会学家费孝通领衔。

当地参与者回忆，费孝通一行的工作保密进行，当时对内称“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对外叫“贵州省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时任织金县民委副主任的彭旭初等人，曾全程陪同费孝通考察。但考察结束后，彭才得知调查内容及目的。

民族调查工作从1955年3月25日在贵阳开会起，总共持续53天。最后，费孝通等人撰写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报告引起穿青人强烈不满，贵州省民委表示，该报告只是学术报告，非最后结论，并示意他们不要公开传播，汇报仅止于县委政府领导即可，穿青人的民族成分，最终要靠穿青人自决。

反对费孝通等人调查结论的彭旭初等人，因坚持穿青人为独立少数民族，到了1957年“反右”变成了“右派”，“罪名”是“想把穿青人列为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县，当县长”。

今天，穿青人虽还保留少数民族待遇，但其少数民族特殊照顾政策，到80年代初只剩下考学加分照顾。在族称方面，原先多自称“青族”，也逐渐变为“穿青人”，称人不称族，渐成省内传统。

### 自己识别自己

在第一次民族识别近30年后，已成为织金县宣传部长的张成坤忽然感到，春天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工作思路彻底扭转，诸多自认为识别不充分或未识别民族的人群，开始要求重新识别。

1979年11月，国家民委下发《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次年12月，贵州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始。

由于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量大，人手不足，鉴于靠国家民委和省民委派人解决并不现实，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苗春亭提出“有民族识别工作任务的地、州、市、县要组织力量，自己识别自己”。

贵州定下“自己识别自己”的方针后，苗春亭指示，本次民族识别工作不过多纠缠族源问题，要把“民族意愿”作为客观存在调研，当做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张成坤由此进入驻织金县的穿青识别组。为走访和收集材料，1982年工作组曾远赴湖北、江西等地考察，对照家谱。在江西五地九县走访后，张成坤他们发现，与民间传说不同，穿青八大姓家谱竟无一个姓氏能在当地对上号，江西地方史志也未发现江西移民填贵州的记载。语言与民俗上亦无相似处。

此次民族调查中，有人发现穿青人某些特征跟布依族很像，曾建议穿青人认同至布依族，但被穿青组其他同事拒绝。寻求成为单一民族，是当时穿青人的愿望。

张发坤等人这次调查结论，同第一次费孝通等的结论背道而驰。他们还发现，穿青人与贵州一些少数民族族谱中来自江西的记载，实为刻意篡改和附会，因为当时乾隆时期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科考，为获考籍，穿青人才纷纷编纂家谱，将身份附会为江西移民。



穿青人应该算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还是从江西迁来的汉人？穿青组在识别过程中也产生了分歧。各方最终决定根据本次调查，认定穿青人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 再次被定为汉族人

1983年6月，张成坤执笔《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报告还在撰写，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就专程赶赴贵州，听取贵州第二次民族识别汇报。

张成坤依然记得当年明8日，他特地从安顺赶到贵阳，在省政协新楼会议室，向费孝通和省委统战、民委汇报的情形。报告指出，穿青人应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费孝通听完汇报后，第二天作了《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的发言。张成坤回忆，费孝通主旨是劝喻大家，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民族，但现在不要再争了。

“他以自己打比方说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民族，可能是历史上打倭寇的倭兵后裔。”张成坤道，“但费孝通说，他现在也不要求少数民族待遇了，故而劝我们也放弃要求。”

这让当时听汇报的穿青人格外不满。不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因撰写《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赴贵州调研，便遇到穿青人抗议费孝通。他回忆，有些人甚至提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过激言论。

1985年，赴国家民委汇报的贵州代表发现大环境明显已变。提到穿青人问题时，屡次被阻止发言。接下来，国家民委要求贵州方面停止继续识别，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

当时的理由是：我国的民族问题，在50年代已基本解决。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不久，国家民委对穿青人问题的报告亦下发至贵州，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单一少数民族”。

农村穿青聚居区出现自发组织游行甚至有人准备去北京上访，社会秩序顿生波澜。

1986年2月1日，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发文，对居民身份证民族文字和民族成份填写做出规定：身份证民族项，应按国家认定的民族名称填写全称。其中特别说明，对已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见，仍应填写为“汉族”。这更激起穿青人不满。

为此，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于1986年4月24日特意开会，专门听取省民委汇报省内待识别民族问题。会后决定，在穿青、蔡家等八个集团的民族成分“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同时决定，贵州省对公安部和国家民委的上述通知不传达、不下发。

次年5月，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发放过程中，贵州省公安厅和贵州省民委特别强调“对国家尚未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解放后一直未填报为汉族的，其民族成份过去怎么填写，现在仍怎么填写。如‘穿青’应填写为‘穿青人’。在处理民族识别问题上，贵州踏出了新路。

然而，民族识别已至此落幕。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称，“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已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对待民族识别问题，亦提出了处理原则，如“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

至此，穿青人寻求单一的少数民族的努力宣告失败，《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重新调查报告》等资料作为史料被束之高阁。

### 认同的歧路

穿青人民族识别渐归沉寂。身份待定的穿青人依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徘徊。

沉默在2003年打破。当年5月，第二代身份证发放前夕，公安部提出穿青人民族成份应填写为“汉族”，且身份系统中没有添加穿青人的民族代码。

此举引再度发穿青人到省民委上访，认为公安部“强迫同化”，更大的上访亦在酝酿中。

最终，循1986年惯例，穿青人保持族称不变。当年8月28日，公安部在《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表态：“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



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尽管如此，穿青人走出省外，依旧身份尴尬。某穿青学生考至重庆，学校以 56 个民族中没有穿青人广族为由，不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要求其改变族称。该学生家长便拿出公安部通知与学校对簿公堂。

张成坤介绍，穿青孩子报考时，民族身份选择确是难题，一旦填成汉族，从此便难以恢复。此外，在第二代身份证普及前，年轻的穿青人出外打工，需办理临时身份证，也需要填报为汉族。

2007 年，另一件涉及到穿青人民族身份的大事，再次震动心焦的穿青老人，张成坤等人再次出山，诸多穿青代表甚至连署签名，抗议不止。

当年 10 月 9 日，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向各县市民族局发文，要求以“穿青人”为首的三个未识别民族，如需认同其他某一民族，需尽快提报地区民族局，以便上报地委、行署。

随后，毕节地区的织金、纳雍、清镇、大方等地分别组织穿青代表座谈。最后，纳雍、织金、清镇的代表先后表示认同土家族，但大方代表决定认同彝族。自认为是个独立民族的穿青人，因行政区划原因，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很可能加入不同民族，这同样让许多人愤懑。

当时曾出面表态“欢迎穿青人认同土家族，但希望穿青人注意政策把握”的贵州土家学会副会长陈国安，事后表达了他的看法：穿青人身份确实尴尬，本民族不认同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不认同它，当地汉族也不认同它。而这次民族认同，又牵扯到毕节地区彝族、回族和苗族的人口比例问题。

穿青人民族认同仍悬而未解，但其民族习俗已一点点消亡。除黔西少数偏远地区在服饰装扮和语言上仍保持其特色外，今天多数穿青人已与汉族外表无异，但其内在的民族意愿，却依然犹如顽石。

#### 没有身份的民族该何去何从？

“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要紧要的。”

2006 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其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写道：“如何解决穿青等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

## 【论 文】

# 五十六个民族是怎么来的<sup>1</sup>

记者 赵家鹏

中国有 56 个民族结论从何而来，中国的民族是怎么认定的？或许始自 62 年前一个女孩奇特的赴京之路。

1950 年 9 月 29 日，来自湖南永顺的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田赴京，是作为苗族代表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但田心桃向周恩来等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

当时，土家族之名并不为人所识。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牵连一个问题，即：中国共有多少民族？当时中国人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4-37 页。

